
日本无条件投降述论*

蒋立峰

内容提要：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问题，是否保留天皇制并不是判断日本无条件投降或有条件投降的要件，而《波茨坦宣言》才是判断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的可依据的最基本文件。该文件条理清晰，内容明确，不容后人发挥或联想。该文件没有关于天皇制存废的直接规定，只是提出要“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所以，日本投降后“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建立了不同于近代天皇制的现代天皇制，这种符合《波茨坦宣言》精神的政治改革与日本无条件投降没有矛盾。历史事实是，日本投降前夕的国内外形势已决定日本若不想民族灭亡，除无条件投降外，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让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同盟国为之奋战多年的唯一目标，无论罗斯福或杜鲁门，在这一点上并无变化。《波茨坦宣言》全文表达的意思就是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即无条件地按照《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最终在日本天皇的干预下，不讲条件地、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而成为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波茨坦宣言 无条件投降 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天皇 终战

作者简介：蒋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21) 05-0023-36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联合发表公告《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简称《波茨坦宣言》或《波茨坦公告》），明确列出促令日本投降的诸项条件，并坚决宣称：“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此诸项条件的最后一条是：“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①《波茨坦宣言》因此也被认作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最后通牒。

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月2日，日本时任外相重光葵“依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及日本国政府之命且以其名义”、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依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且以其名义”，于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下列人（即二签名者）兹对合众国、中华民国及大不列颠国之政府首脑，于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于波茨坦发布，尔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参加之宣言之条款，依日本国天皇、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且代表其接受。右述四国以下称之为‘联合国’。下列人兹布告，日本帝国大本营及不问于何位置之一切日本国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军队，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下列人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对不问在何位置之一切日本国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军队之指挥官，速即发出旨在自身及在其支配下之一切军队无条件投降之命令。”“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置于为实施本投降条款而采取认为适当措施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②

凶顽残暴、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

①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77、78页。“吾人”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及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的代称。

② 《（日本）投降书》签署时原始文本只有英文文本，名为“INSTRUMENT OF SURRENDER”，参见：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降伏文書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Proclamation 連合国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 布告第一号』、<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image/B18090005800> [2020-09-10]。据此翻译的中文文本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112—114页（另有多种版本）；日文文本参见：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官報号外（詔書、降伏文書）』、<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50900> [2020-09-10]。三种文本大意相同，但用词小有差异。三个文本中，英文的“we”，中文译为“余等”，日文译为“下名”；英文的“the Allied Powers”，中文译为“同盟国”“盟国”“联合国”，日文译为“連合国”；英文的“the Supreme Commander”，中文译为“统帅”“最高司令官”，日文译为“最高司令官”；英文的“the Emperor of Japan”，中文译为“天皇”“日皇”，日文译为“天皇”；英文的“the Japanese Government”，中文译为“日本帝国政府”“日本国政府”，日文译为“日本国政府”“日本帝国政府”；诸如此类，用词翻译缺乏统一性，不甚严谨。考虑到本文主要目的乃与日方论辩，并帮助中方人士了解日方对某些重要文件是如何理解的，故本文的一部分重要引文依照日文文本直译而成。上述《（日本）投降书》的引文即译自日文文本，故采用日文文本原词，比如“連合国”译为“联合国”，而未译为“同盟国”。日语中虽有“同盟国”这一词汇，但日本人在翻译该类文件时，是不会使用“同盟国”而只会使用“联合国”的。当然，此“联合国”并非194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本文叙述时则对同盟国和联合国加以区分，而使用“同盟国”或“盟国”。至于“天皇”一词，日本自身一直赋予“天皇”以浓厚的政治含义，汉字圈国家对之不能漠然置之，直称“天皇”难免有被日方一些人理解为承认其“天下独尊”之意之可能，故称“日皇”或“日本天皇”较为适宜。

的联合重拳打击下土崩瓦解、无条件投降了。但投降后的日本仍有许多问题，如领土、战犯审判、战争赔偿、经济改革、法制改革及社会改革等问题需要逐一解决，为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许多重要的历史教训值得思考总结。而与上述问题皆有关联和影响的，首先是怎样认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问题。

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也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主流观点、基本观点。但进入 80 年代后，史学研究日趋活跃，对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同看法。1980 年陈正飞发表《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一文，认为“日本无条件投降，严格说来是不确实的，它是有条件的，即日本还是保留了‘天皇制’”。^①自此以后，阐述“日本有条件投降论”的文章日益增多，尤其在 1995 年日本投降 50 周年前后，几成潮流。笼统观之，这类观点的核心论据只有一个：在美日交易下或美国纵容下，日本得到美国保留天皇制的许诺方决定投降，而投降后的日本确实保留了天皇制。例如，谈艳萍《从〈波茨坦公告〉的策划看日本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有条件投降》认为，公告在处理德日问题上存在重大差异，并称：“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左右，美国就将其有意维护日本天皇制的打算透露给日本谈判对手，敦促日本在苏联出兵参加作战之前向美国投降。”从而得出结论称，“美国在得悉（日本）照会后，立即进行讨论，认为可以接受。由此可见，美国领导人在明知日本不愿意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而接受了日本的有条件投降”。^②当然，徐康明主张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四篇论文也是了解“日本有条件投降论”的必读之作。^③而主张“日本无条件投降论”方面，则有黄瑞云《关于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小议》、周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探讨》、孙凤山《日本“有条件投降”质疑》和《也谈日本投降的条件问题》、邱维骥《二战铁案：日本无条件投降——驳“日本是有条

^① 陈正飞：《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4 期，第 60 页。

^② 谈艳萍：《从〈波茨坦公告〉的策划看日本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有条件投降》，《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4 期，第 20、21 页。

^③ 参见徐康明：《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形成和作用》，《历史教学问题》1985 年第 4 期，第 12—16 页；《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有条件投降》，《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8 期，第 19—25 页；《日本的“有条件投降”及其消极影响——日德两国投降情况比较》，《日本学刊》2000 年第 2 期，第 129—145 页；《意、德、日三国投降情况比较——四论日本的有条件投降及其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329—1350 页。

件投降”之说》等论文^①，从多方面、多层次阐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论点。关于中国学者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整体研究状况，赵文亮《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有条件投降？——近 20 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日本投降方式问题的研究》一文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可参考。^②

日本投降，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如何认定日本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有条件投降，则成为与立场、方法和资料均有密切关系的研究课题。遗憾的是，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首先在充分掌握史料方面便存在较大缺漏。既然日本投降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国与日本两方面的事，那么大量掌握和研究日本近二三十年公布的史料便不可或缺，仅凭一部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很难形成客观准确的认知。本文欲在此方面做出努力，基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暴政、反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立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为指导，依据大量的日方历史文献资料，用以叙带论的方式，论证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从而主要对日本存在的“日本有条件投降论”和“日本天皇、政府未投降论”做出回应，认定它们都是不能成立的。

一、日本的荒谬主张与国际共识相悖

本文所称“日本无条件投降”，即战败国日本（包括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日本战时大本营及其统辖指挥的全部武装力量、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国民）无条件地接受同盟国提出的、规定日本必须做到的《波茨坦宣言》，其代表完全按照同盟国的要求在《投降书》上签字，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日本全部武装力量放下武器，听候同盟国处理。必须强调的是，同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是判断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可依据的最基本文件，该文件条理清晰，内容明确，不容后人发挥或联想。该文件没有关于天皇制存废的直接规定，只是提出要

^① 参见黄瑞云：《关于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小议》，《湖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4 期，第 1—2 页；周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探讨》，《军事历史》1992 年第 4 期，第 33—36 页；孙凤山：《日本“有条件投降”质疑》，《常熟高专学报》1999 年第 5 期，第 31—34 页；孙凤山：《也谈日本投降的条件问题》，《安康师专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19—22 页；邱维骥：《二战铁案：日本无条件投降——驳“日本是有条件投降”之说》，《历史教学》2003 年第 7 期，第 35—39 页。

^② 赵文亮：《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有条件投降？——近 20 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日本投降方式问题的研究》，《许昌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第 110—113 页。

“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①，所以，日本投降后天皇制的存废不能成为判断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的标准。

虽然日本无条件投降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但实际上，日本自1945年8月14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时起，就存在着与《波茨坦宣言》和《投降书》精神完全悖逆的主张。

（一）日本的荒谬主张：“日本有条件投降论”和“日本天皇、政府未投降论”

有日本媒体将投降称为“讲和”“停战”，宣称日本与美英中苏四国需签订停战协定，再缔结休战条约，以完全脱离战争状态。日本陆海军指挥部还下达了“停战大命”，而不是“投降大命”。^②但随着日本投降的历史进程，这种“停战论”很快演变成了“合意论”乃至“有条件投降论”。

日本的“有条件投降论”，认为日本并非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投降，其理由是既然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所列条件而投降，则应该是有条件投降，甚至是非颠倒地主张是盟国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即在以保留天皇权力地位和天皇制为条件下日本才投降。更甚之者，以《波茨坦宣言》条款为依据，主张虽然日本大本营及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但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并未投降。

日本投降后，日本外务省便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撰写批驳“无条件投降论”的文章，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文章如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田冈良一撰写的《终战后日本的法律地位》一文。田冈认为，关于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和《投降书》，只是规定“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但因世间将此称为“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而造成了日本作为国家无条件投降、陷于“联合国”属国地位的表象。以此为基础来判定日本的法律地位不是正确的方法，是误解。所谓无条件投降是美国单方面的发明，不具备国际法依据，有价值的是日本与“联合国”间的“合意”。若德日比较，德国是丧失政府，被“联合国”征服而结束战争；日本则本土未被占领，以天皇为首的政府俨然存在，日本与“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战争不是因为被征服而中止，而是因为“合意”而终了。1945年8月11日，“联合国”方面答复称接受了日本的条件，日本才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书是双方的终战“合意”，是和平契约。宣言不是

^① 《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78页。

^② 『朝日新聞』1945年8月17日、8月20日。

契约，而是“联合国”方面的政策主张，也是“联合国”支配日本的国际法依据。麦克阿瑟元帅的命令及日本应尽义务的界限，在国际法上均以宣言为依据。投降后日本的主权无疑蒙受巨大限制，但仍未丧失全部主权而陷于万事听命于“联合国”指令的地步。“联合国”对日本主权的限制是局部的，而非全部，是一时的，而非永久。^①日本刚刚投降，这些日本人便以为时过境迁，要抓住一切机会为日本“洗白”，待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后，就更加不顾一切地搞起翻案以“正名”。如 1945 年 8 月 15 日辞职的外相东乡茂德在 1949 年 5 月狱中交代时就说，《开罗宣言》说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波茨坦宣言》只说了“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没有一处说“日本无条件投降”。《波茨坦宣言》有言“条件如下”，因而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盟国的答复也只说“日本投降”而未使用“无条件”的字眼。所以说，整体的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波茨坦宣言》的内容。^②

此后直到 1995 年，这些观点仍有不小的影响。该年，日本右翼思潮大回潮，其中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写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堪称日本右翼皇国史观、战争史观的集大成者。书中有庆应义塾大学江藤淳教授的报告《关于所谓的“无条件投降”》，江藤多处承袭了田冈的观点，认为“日本没有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宣言》不等于无条件投降”。“总之，在这个《波茨坦宣言》的整个文件中，只有这一处用了‘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即只是在写了‘全日本武装部队的无条件投降’的同时，用了‘无条件投降’，不是说‘全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江藤还认为，《波茨坦宣言》比此前美国国务院的对日政策有所倒退，对日本更为有利。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写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日本’是指‘政府和武装部队’，即把政府和军队放在了一起。所说的政府当然也包括天皇。美国国务院是要求整个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波茨坦宣言》却只是要求解除军队的武装”。^③作为知名大学教授的江藤淳阐发的上述主张影响颇大，以致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鼓吹民族扩张主义的重要依据。

①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終戦後の日本の法的地位（日本の外交権等）』、<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40600>[2020-09-15]。本段译自日文原件，其言“联合国”即同盟国之意。

② 佐藤元英・黒沢文貴編『GHQ 歴史課陳述録—終戦史資料—』(上)、原書房、2002 年、290 頁、310 頁。

③ 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年，第 133、137 页。

后文将以清晰的历史事实来阐明，“日本有条件投降论”和“日本天皇、政府未投降论”这些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日本在投降时是否为无条件的，只能从日本投降这一时间点上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至于日本投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盟国的对日政策亦随之发生变化，因之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在形式上得以保留（本质上与投降前有根本性改变），这并不能成为否认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依据。

（二）盟国共识：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方的上述荒谬主张显然与盟国的国际共识相悖。其实，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是盟国十分明确的一贯方针。早在1943年1月美英首脑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卡萨布兰卡会晤时，罗斯福即采纳了美国国务院于1942年5月提出的限令德日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建议，向记者明确表示，结束战争的唯一条件是德意日无条件投降，而不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通过谈判停战。丘吉尔表示完全赞同这一主张。^① 丘吉尔的回忆录也印证了这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事实：在1943年1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我听到总统说，对于所有的敌国，我们都会尽全力地迫使它们‘无条件投降’时，我着实感到惊讶”。“在总统发言完毕后，我也对其发表了谈话，我理当同意他刚才的意见，并且支持他。”而后针对国际上认为追求无条件投降会使敌人更顽强抵抗从而使战争延宕这一糊涂观点，6月30日丘吉尔在另一个场合演讲时，对“无条件投降”做出了明确的诠释：“我们所有的同盟国，共同提出让法西斯、纳粹和日本的独裁统治者无条件投降。这里的‘无条件投降’是指，我们必须将它们的抵抗想法彻底粉碎，而它们也将完全且必须听从我们对此事的处理。为了不让那些蓄谋已久的野心和凶狠残暴的侵略再次将我们的世界拉入动荡之中，不让我们的世界又一次遭到破坏，不让疯狂的战火将它烧毁，我们务必要采取一切必要且具有远见性的措施。但这不代表，也绝不可能代表：我们强大无比的武器被染上了污点——我们绝不会在行为上缺乏人道，也不会仅仅出于复仇而泯灭人性。更不代表我们不会去打造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个各国人民都能享受‘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颂扬——的世界。”^②

^① 郑维和等编译：《二战秘档全公开丛书·二战8政要巨头谋略秘档全公开》（上），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世界大战丛书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08 挽回非洲局势》，富杰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第316—318页。

丘吉尔和罗斯福主张的“无条件投降论”完全体现了 1941 年 8 月 14 日二人制定的《大西洋宪章》的基本精神（不追求领土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政府形式、解除侵略国家的军备、重建和平，使全人类自由生活、无所恐惧等）^①，与斯大林及后来的杜鲁门的现实主义式“无条件投降论”不同，是理想主义式“无条件投降论”。这种理想主义式“无条件投降论”的首要目的就是完全、彻底消灭侵略国的武装部队，而不是击溃打败即可。也就是说，侵略国需要“完全且必须听从我们对此事的处理”，按照盟国要求（或称“条件”），其武装部队完全放下武器，彻底缴械投降，就达到了使侵略国无条件投降的基本目的和要求，就是侵略国的无条件投降。这就能为以后建立适意、安全、自由、幸福的和平国家、地区和世界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

此后的 1943 年 10 月 30 日，发表于莫斯科的《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亦表明四国一致决心，“对它们现正分别与之作战的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② 随后于 11 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在占领日本、日本投降后的政权形式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于 12 月 1 日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称“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③ 开罗会议后随即召开德黑兰会议，斯大林于 11 月 30 日的午餐会上，向罗斯福、丘吉尔说：“《开罗宣言》看过了，虽然不能做出任何承诺，但完全赞同这个宣言和它的全部内容。”^④ 可见，《开罗宣言》是在获得斯大林首肯后发表的。因此可以说，在 1943 年末，理想主义式“无条件投降论”与现实主义式“无条件投降论”融合在一起，即同盟国核心四国在“最终必使轴心国无条件投降方可结束战争”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或称约定。德意日无论如何猖狂挣扎，其最终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命运在这一时刻已经确定而无法改变。

1945 年 4 月 12 日，罗斯福病逝，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立即表示要继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337—338 页。

②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 403 页。

③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 407 页。在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的主张对罗斯福有一定影响。关于日本的天皇制问题，罗斯福指出，美国国内舆论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要求废除日本天皇制。蒋则答曰：“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起来与闻日本政治以外，至于他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转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 1911—1949 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51、552 页。

④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57—58 页。

续推行罗斯福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将尽力按照我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做的那样做下去”。^① 16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讲，做出保证称要继续奉行罗斯福总统的战争与和平的政策，并着力宣示：“我们的要求一直是也仍然是（德日）无条件投降，我要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个方针必须也必将会保持不变和不能受到阻碍。”^② 5月9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发表声明：“在日本的军事和海军力量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之前，我们的打击决不停止。”^③ 此后的事实也表明，杜鲁门有言必行，既行必果，在日本无条件投降问题上决不会退让。7月24日，美英军事统帅部在波茨坦商定下一阶段的军事部署，确认“我们的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要日本尽可能早地无条件投降”^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措辞严厉的《波茨坦宣言》。^⑤ 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中美等国付出了巨大牺牲，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为正义国家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并最终必须实现的不可更改的底线。

二、内外因素决定日本只能无条件投降

在讨论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前，首先需从日本在投降前所处的内外环境来分析日本有无在无条件投降之外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

（一）日本丧失本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争经济崩溃

1944年，日军的“一号作战”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损兵折将，未能达成有效打通中国华南交通线的目的。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策略是，不派美国军队进入中国大陆与日军纠缠，而是由南太平洋逐步推进，最后攻入日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李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第1、4页。

^② 中宣部学习出版社等制作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抗战》，2015年，第124集。

^③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117页。

^④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313页。

^⑤ 日本有条件投降论者经常引用《杜鲁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助理国务卿格鲁在5月下旬曾和我谈起发出一个宣言以促使日本投降的问题，他说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允许保存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格鲁用他从出任驻日大使十年的经验中所获得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我告诉他我自己也曾考虑过这件事，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真知灼见。格鲁还草拟了一个宣言。……6月18日，格鲁报告说，这个建议已经受到他的阁僚们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认可。……我作出决定，对日本的宣言应由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发出。”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354页。这段话只能说明对于美国是否承诺日本投降后保留天皇制，美国国内高层存在不同意见。但如前文所述，美国国内也存在更多的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要求废除日本天皇制的意见。显然格鲁所代表的意见最终没有被写入对日基本政策性文件《波茨坦宣言》中，因此格鲁的主张便不能成为认定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依据。

本本土。进入 1945 年以后，日军在菲律宾频遭美军重创，菲律宾已失去拱卫日本的南部屏障作用。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战争经济得到更大发展，美国增产了大批量轰炸机，迅速升级对日本的大轰炸，包括当时最强大的轰炸机 B29 超级空中堡垒战略轰炸机在内，每日都对日本各地实施饱和式、地毯式、波浪式轰炸。仅日本投降前一天的 8 月 13 日，美军就有 1000 架航母舰载机对东京进行了轰炸。日本军民死伤无数，各大城市多半被毁，甚至被夷为平地。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这时除了轰炸机的疯狂轰炸，还有当时最先进的 P51 野马战斗机在日本各处低空扫射，甚至一些小型机也能飞到东京八王子上空肆意枪击。显然，日本已彻底丧失了制空权。实际上，早在 6 月美军占领冲绳后，日本败局已无任何悬念，但美国为复仇绝不会手下留情。在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美军的第三舰队（航母 15 艘、战舰 8 艘、巡洋舰 17 艘、驱逐舰 63 艘）、太平洋舰队的潜水艇舰队和英国的舰队（航母 4 艘、战舰 1 艘、巡洋舰 6 艘、驱逐舰 16 艘）以及美英两军的补给舰队，已将日本本土四岛如铁桶般围住（仅航母就多达 19 艘）。日本的制海权不仅被清零，而且变成极大负值，海洋已成为盟军封锁、压垮日本的最有效路径。

此时日本国内已完全是一派战争末期的景象。日本的战争经济已经完全破产。因铝材短缺，只得开始生产“木制飞机”，但多不能升空作战。日本引以为傲的世界最大战舰“大和舰”于 1945 年 4 月 7 日在鹿儿岛南端的坊岬冲海战中遭美军 11 艘航母、300 架攻击机围攻而被炸沉，日本已无能够战斗的战舰。日本原有的 19 艘航母（包括 5 艘由商船、邮船、客船改装的仅能承担运输任务的航母）也已在 1942 年 6 月的中途岛海战及此后的历次海战中陆续被美军击沉，尚存的 6 艘航母（包括 3 艘运输用、练习用航母）则成为无舰载机、无动力油的“趴窝僵尸”，对美军的攻击毫无招架还手之力。由于兵源枯竭，日本政府只能召集 2000 万学生组成青少年学生队参军作战，《战时教育令》称此为“皇国之安危正背在学徒之双肩”^①。老人、妇女不仅要学会投掷手榴弹准备参加本土决战，日常生活上也要根据“食物生活新设计”扩大食物来源，如甘薯叶蔓、桑叶、橡子、蒲公英、艾蒿、藜、露草、狗蓼、稗草、苋菜、苜蓿、三叶草、紫云英等数百种野生植物，及青蛙、蜥蜴、蜗牛、蝶螈等野生动物，凡看得到、想不到的山草野物都成为经“科学分析”推荐给百姓充饥果腹的食物。“树根、树叶都能成为决战时的食品”，“吃八分饱也

^① 『朝日新聞』1945 年 5 月 22 日。

会产生满腹感，方法就是少食精嚼”，“可替代大米百万石以上”。^①显然，日本已处于物资极度匮乏、苍民无以聊生的极度危机状态。^②

（二）美军的宣传及原子弹爆炸使日本陷入绝境

美军在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同时，也不忘对日本民众采取攻心策略，在日本各地前后投放了数以千万计的传单，鼓动其怠战、反战，以达到对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战争政策釜底抽薪之效。传单的内容生动丰富，很具说服力，有《波茨坦宣言》的全文、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盟国给日本政府答复的全文以及美国总统杜鲁门《致日本国民书》等。其中，《致日本国民书》说：“纳粹德国的毁灭使各位日本国民认识到了美国陆海空军的绝对的攻击力。……直至日本军部完全无条件投降，放下武器，美军绝对不会停止进攻。……可断言，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日本国民的灭亡和奴隶化。”^③有一份传单说得很有力：日军相继丢掉了塞班岛、硫磺岛和冲绳岛，日本军部总是说“那也不过是另一个岛子”，“那么请考虑日本本土也不过是正面临与这些岛屿同样命运的另一个岛子”。另有一份传单将日本军阀比喻为“专门吸吮日本国民鲜血”的民间传说中的“妖猫”，呼吁“忠义的日本人”“剥去其化皮”，“消灭军部”，“再次恢复日本的和平与繁荣”。^④还有一份传单说：“拯救日本之道不是军首脑者们的豪言壮语，只有日本国民倚仗‘无条件投降’才能拯救家乡。”^⑤尽管日本内务省规定民众拾到传单必须上交，严禁散播其内容，否则将予以重罚，但仍有不少百姓将传单藏匿起来。显然这一攻心策略的效果是不可低估的。^⑥

① 『朝日新聞』1945年7月5日、7月11日、7月16日、8月9日。

② 日本当时的统治者不会也不敢公开承认日本国内面临的困境，直到日本签署《投降书》后的9月5日，时任首相东久迩为给统治者们开脱战争责任，才在第88届帝国议会的讲演中说了实话：“至本年（1945年）五六月间，继续进行现代战争的物质战力基础已极度削弱，尽管军官民协作采取一切对策，但在最近的将来想要彻底转换物质国力是十分困难的。尤其冲绳战役结束以后，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参见：「第88回帝国議会 衆議院 本会議 第2号 昭和20年9月5日」、<https://teikokugikai-i.ndl.go.jp/#/detailPDF?minId=008813242X00219450905&page=1&spkNum=0¤t=3> [2020-10-11]。

③ 参见：「焼け残り沿線住宅に撒かれた米軍ビラ」、<https://chinchiko.blog.ss-blog.jp/2017-03-08> [2020-10-11]。

④ 参见：「米軍投下ビラ」、<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3947482> [2020-10-11]。

⑤ 参见：「投降ビラ『伝単』の世界」、<https://tanken.com/dentan.html> [2020-10-11]。

⑥ 内大臣木户幸一即认为，8月14日敌机投撒登有盟国答复内容的传单，对日本危害很大，因为此前军民一直不知此事，时间一长有使军队发生政变、全国陷入混乱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传单促进“终战”。参见：『木戸幸一日記』（下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1226頁；佐藤元英・黒沢文貴編『GHQ歴史課陳述録—終戦史資料—』（上）、10頁、43頁。

1945 年 7 月中旬，美国试爆原子弹成功。美国预计进攻日本本土将会出现 50 万美军士兵的牺牲，为了避免此结果，并加速日本投降的进程，美国决定不搞核威慑，而是搞核直用，即不以任何技术上的示威（如在荒岛上投原子弹）向日本施压，而是将原子弹作为战争武器立即、直接投入使用（已获得英苏赞同）。7 月 24 日（即发布《波茨坦宣言》前二日），美国陆军部发出指令，在 8 月 3 日以后气象许可的条件下，尽快以广岛、小仓、长崎、新潟为序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由此可知《波茨坦宣言》中的对日严厉措辞绝不是恫吓）。8 月 6 日、9 日，作为对日本政府无视《波茨坦宣言》的“回报”，为震慑仍在叫嚣“本土决战”的顽固军国主义分子，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杀伤力巨大的原子弹。^①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 8 月 6 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发表声明称：“如果他们（日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的毁灭将自空而降，类似的情况地球上从来不曾有过。”^② 原子弹爆炸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心理防线，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发动侵略战争遭到的报应。其实，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在 1941 年即下令开始研发原子弹并取得一定进展，不过天道不佑日本，因本土缺乏原料、德国援助原料的运输船在马六甲海峡被美舰击沉、实验室在 1945 年 4 月被美军炸毁等原因，日本终未获成功。^③ 有此背景，包括日皇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实无资格批判美国使用原子弹。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张口闭口“维护国体”，从不讲“维护

① 这也可以看作美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此后历次战役中给美军造成巨大损失的报复、复仇。日本不自量力地惹怒美国，终食原子弹爆炸恶果。日皇裕仁在总结日本战败原因时，便将“过分相信皇国而轻蔑英美”列为三条原因的第一条。参见：『72 年目の終戦の日に思うこと（2）「父より」天皇陛下の手紙』、<https://ameblo.jp/setokenichiro/entry-12301611805.html> [2020-10-20]。有此惨痛教训，战后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不足为怪。同样，苏联打败日本关东军，将约 60 万俘虏（多种统计有差异，本文取中概数）押往苏联西伯利亚等地做苦力，这也可看作是对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报复。大国中只有中国自认为是“仁义之师”，要“不念旧恶”，“与人为善”。参见：《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向国内外的广播讲话》（1945 年 8 月 15 日），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0 页。此讲话以日文在日本出版时，“仁义之师”则被曲译为“神圣抗战”。参见：蒋介石『日本に与える書』、中国文化社、1946 年、185 页；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蒋委员长演说集 日本軍民に告ぐ』、1945 年、115 页。

②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 361 页。

③ 另据 2013 年 8 月 15 日德国《世界报》刊登的文章《日本天皇当初要制造原子弹》报道，1945 年 8 月 9 日曾有数名美国核物理学家空投劝降信至长崎附近，要求日本同行转告日军统帅部，日本如不立即投降，将会有“原子弹雨”落在日本。实际上美国已计划在 8 月 17 日或 18 日在名古屋一带再投一颗原子弹。10 月以后，美国将具有每周制造一颗原子弹的能力。参见：http://www.81.cn/jsdj/2017-11/14/content_6981898_2.htm [2020-10-20]。另有 8 月 9 日、10 日美军投放的传单称：“请立刻撤离城市！苏联也已对日宣战。美国发明并使用了如今任何国家不能得到的原子弹，仅一颗原子弹就能匹敌 2000 颗能量巨大的 B-29 炸弹。美国将使用这种可怕的原子弹破坏欲延长此无益战争

黎民百姓”，其坚持战争的顽固态度最终造成了数十万日本民众瞬间丧命的悲惨结局，这是其应承担的战争罪责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三）苏联对日宣战和中国开始反攻成为击倒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两记重拳

8月8日，苏联废除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并对日宣战，翌日迅速出兵，一周内即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外缘地带，形成了对驻守在中部大城市的日本关东军的强压态势。^② 铃木首相为关东军不堪一击而感到意外，日本军国主义统治

（转接34页注释③）

的一切军事力量。在美国未更多地使用这种原子弹前，希望诸君向天皇请愿停止战争。否则美国将坚决使用这种原子弹及其他一切先进武器，迅速且强制性地结束这场战争。”参见：<http://yahalab.com/edaloco/chronicle/war/dentan/0810.htm> [2020-10-20]。另有美国学者称，存档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美军机密文件表明，日本曾在朝鲜北部兴南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和制造，并于1945年8月12日晨在兴南附近日本海面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其威力与美国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威力相当。参见：《原子弹风云（一）二战中的原子弹（4）》，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418/06/10101824_464034945.shtml [2020-10-20]。不过以上关于美国学者的二则报道可信度几何，仍需考证。

① 当然，日本大多数民众虽然在战争时期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战争，但他们毕竟是受蒙蔽者、被鼓动者，这些人蒙受原子弹灾难值得同情。另外，美军在投放原子弹前是否对日本民众有所预警，至今仍无定论。据说在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前，美军曾投放了数百万张传单让市民逃避。参见：「海外『戦時中、日本へ原爆投下前に米軍はビラで警告してた?』→『それは間違いだろ』海外の反応」、<http://tamenal.com/32582> [2020-10-20]。7月28日、8月1日、8月5日美军三次投放了数百万张传单，其内容是：“数日内美国空军将轰炸传单背面所列城市全部或其中若干城市的军事设施。”“但是炸弹不长眼睛，不知会落在何处。如你所知，人道主义的美国不想伤害无罪的人们。所以请你们从背面所列城市避难他处。你们不是美国的敌人，只有把你们拖入战争的军部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考虑的和平只是把你们从军部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样就能建设更好的新日本。”三次传单列有久留米、高冈、佐贺、八幡等共36座城市，但没有广岛和长崎。传单最后说：“即使不是背面列举的城市，说不定也会被轰炸，但至少背面列举的城市一定会全部或部分被轰炸。再次提起注意，请从背面列举城市避难吧。”参见：「米軍投下ビラ」、<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3947482> [2020-10-20]。另外，丘吉尔在回忆录中也谈及此事：“由于日本军事统治者们不接受（《波茨坦宣言》所列）这些条件，美国空军准备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一颗原子弹，他们为此制定了计划。我们赞同给予居民全部准备机会。我们非常细致地拟定出实施的步骤。我们于7月27日散发传单，让11座日本城市知道它们将遭遇猛烈的空中轰炸，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生命的损失。7月31日，我们还警告了其余12座城市，并在8月1日对其中4座进行了轰炸。8月5日，我们发出了最后一次警告。据悉到那时，超级空中堡垒每天会散发一百五十万张传单，外加三百万份最后通牒。第一颗原子弹是在8月6日投下的。”参见温斯顿·丘吉尔：《世界大战丛书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2 铁幕》，王敏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第313页。还有，战后广岛原爆难民的回忆也值得关注。中村恭子回忆道：“（原爆）数日前，美军投放的传单就说8月6日将有新型炸弹降落，劝市民逃走。母亲看到这传单想，要不就躲一躲吧，所以去了郊区。要不然……（必难逃噩运了）。”艺备银行职员高藏信子回忆道：“7月末就有传单说8月5日广岛大空袭，我们都吓得够呛。因为广岛还没有遭受过真正的轰炸，恐惧感更是与日俱增。但8月5日什么也没有发生，到8月6日的早晨，在艺备银行和同事们聊天，正说着‘美军还是骗人哪’，一道闪光带来的风暴将职员们推倒撞在了墙上。”还有，当时驻守在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日本陆军通讯队的士兵也说收听到了“美国之音”的预告。参见：「原爆投下前に米軍からの予告ビラはあった」、<https://hiroshimastyle.com/blog-entry-905.html> [2020-11-20]。

② 苏军采取围而不打策略，等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关东军宣布停止军事行动，19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签署了投降书，苏军即迅速占领了日军交出的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大城市，但外缘地区少数日军要塞仍有战斗，东宁要塞的战斗直到30日方结束。但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只能查阅到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劝降书，而查阅不到山田乙三签署的日本关东军向苏军的投降书，如果能从俄罗斯公开的档案中查到此投降书，则颇具研究意义。

集团企图依靠苏联“调停”、保住“后方满洲”以苟延残喘的充满投机、侥幸色彩的幻想彻底破灭。8月9日，毛泽东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① 遭此一连串沉重打击，日本民众对战争前途的心态已是斗志全无，万念俱灰，陷入深深的绝望。^②

三、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日本投降的过程一波三折，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内部对日本投降或拒绝投降、怎样投降存在多种主张，最终在形势的压迫和日皇的支持下，日本选择了无条件投降。

（一）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无条件投降的经过

在《波茨坦宣言》发表后，日本统治集团就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展开讨论时，外相东乡茂德就是主张接受《波茨坦宣言》一派的代表人物。1945年8月9日晨，东乡对打探消息的高松宫明确表示：“（形势）已毫无办法，只能原封不动地接受《波茨坦宣言》。”^③ 当日，美国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国军队开始全面反攻。日皇心急，惊恐不堪，指示“立即传命首相按预定方针努力迅速结束战争”。首相铃木贯太郎闻旨后表示，“事既至此，只能以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方式结束时局”。^④ 随后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接受《波茨坦宣言》是附带一项条件（保留天皇制）还是四项条件（再加上日本自主解除武装、自主处置战争责任人、外国军队不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8页。

② 当时的众议院书记官长大木操在日记中写道：1945年8月9日晚“在回家途中，在中野车站，有人手拿《朝日新闻号外》向车厢内的乘客散发。大字标题是‘苏联对日宣战布告’，还登载了莫洛托夫外相的宣言，通告9日零时进入交战状态。车中乘客皆默然阅读。我注意到人们的表情皆无任何变化，没有出声，唯有静默。其中有军人、年轻人、工人，这种现象如何解释？皆呆然失措，或以该来终来而认头，或认为军人之事与己无关，难以判断。我以为总会有人站起来慷慨陈词一番，也未见到，真悲惨啊，可以说整个国民都是这样毫不关心的状态”。转引自：升味準之輔『日本政党史論』（第七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444頁。

③ 佐藤元英・黒沢文貴編『GHQ 歴史課陳述録—終戦史資料—』（上）、315頁。“原封不动地接受”的日文为“そのまま受諾する”。

④ 佐藤元英・黒沢文貴編『GHQ 歴史課陳述録—終戦史資料—』（上）、9頁、10頁。

驻日本) 未能达成一致。东乡主张: “应迅速接受《波茨坦宣言》, 只提出对日本绝对必要的条件, 即保证皇室安泰。如果提出多项条件, 从最近美英苏支等方面的情况看, 很可能被拒绝, 就要做好交涉被根本破坏的准备。”^①

同日下午的内阁会议仍为接受《波茨坦宣言》是否附带提出条件以及提出几项条件争论不休, 阁议中间休会时木户幸一内大臣向铃木首相传达了日皇最高指示: “不要附带条件, 从速行事”。^② 在当天深夜至翌日凌晨召开的御前会议上, 针对阿南惟几等军中死硬派疯狂主张的“本土决战”“期望玉碎”“死中求活”^③, 日皇表示支持外相东乡茂德只附带一个条件而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主张。御前会议后, 日本当日通过瑞士和瑞典政府向美英中苏四国政府发出《日本帝国政府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之申告》。此申告在对日皇和日本政府进行了“为促进世界和平”“避免人类惨祸”一类自我美化后称: “帝国政府在对 1945 年 7 月 26 日美英支三国政府首脑在波茨坦发表、而后苏联政府参加的共同宣言所列举之条件中不包含对天皇国家统治大权加以变更之要求的理解下接受之。帝国政府相信上述理解无误, 切望对本件表示明确意向。”^④ 一般以为, 日本政府以此向盟国提出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投降的条件, 似乎如果不能得到盟国的肯定式回答, 则日本拒绝投降。实则非也。日本只是发出了一个意在辩解并提出希望的“陈情表”而已, 其原稿甚至并不要求对方回答, 也没有显露出“不成功便成仁”的豪壮气势, 此申告不过是为掩盖日本战败而抖出的一块遮羞布而已。^⑤

① 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官公庁資料編纂会、1951年、569頁。“支”为当时日本统治者及国民对中国的蔑称, 下同。

② 波多野澄雄『宰相鈴木貫太郎の決断—「聖断」と戦後日本—』、岩波書店、2015年、166頁。

③ 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588頁。

④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ポツダム」宣言の条項受諾に至る経緯』、[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48500\[2020-11-20\]](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48500[2020-11-20])。此文件依照日文本译出, 与《国际条约集(1945—1947)》载中文文本有较大出入。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 第104页。一般称此重要历史文件为日本“乞降照会”, 但此译名并不准确, 而应译为日本陈述要求、表达希望之“申告”(“申告”的日文为“申入”)。

⑤ 时任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涉泽信一事后回忆道: 关于8月10日日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申告, 外务省的原案是作为一个谅解事项提出关于天皇地位问题, 语气要尽可能缓和, 并不要求对方回答。但在御前会议上, 由于枢密院议长平沼骥一郎“横插一杠子”, 认为天皇的统治大权非依国法而生, 非由宪法而定, 不过仅由宪法叙述而已, 故原案中“不包含变更日本天皇国法上之地位之要求”应改为“不包含对天皇之国家统治大权加以变更之要求”, 所以正式提出的申告即依此改定, 并要求对方回答。参见: 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598頁、633頁; 佐藤元英・黒沢文貴編『GHQ歴史課陳述録—終戦史資料—』(上)、349頁。显然, 对盟国而言, 此两种说法无大差别, 均属“陈情表”而已。

但事与愿违，美国总统杜鲁门迅即召集高层商议如何答复日本。史汀生陆军部长和李海海军上将从尽早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的角度主张接受日本的要求或称条件；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提议，可以在答复中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宣言》的意图和目的的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然而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后退。我们的要求是在原子弹爆炸前、苏联参战前向日本提出的。到现在如果必须要提出条件的话，也应该是由美国而不是由日本提出条件。”^① 杜鲁门与贝尔纳斯观点一致，于是请贝尔纳斯起草可以表达这一意图的答复，然后将草案通报英、苏、中，商议后取得一致意见。^② 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四国政府答复称：“自投降时始，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采取认为其必要的措施的联合军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之下。天皇应授予并保证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为实施《波茨坦宣言》各项条款所必要的在投降条款署名之权限。天皇应命令日本国一切陆海空军官宪及不问何地之此等官宪指挥下之一切军队停止战斗行动，交出武器，及发出最高司令官为实施投降条款所要求之命令。”“日本国政府的最终形态，应按照《波茨坦宣言》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达之意愿决定之。”^③ 显然，此答复明确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贯彻了“彻底实现《波茨坦宣言》的意图和目的”的宗旨，没有显示出任何从《波茨坦宣言》后退和让步的迹象。即：第一步，首先对日皇过去无限制的所谓“国家统治权”予以明

① 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367页；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627頁、628頁。

② 商议时，英国首相艾德礼对原稿要求日皇亲自签署投降条款表示怀疑，中方蒋介石则尤其同意须由日皇和日本最高统帅部签署投降条款并发布执行投降条款的命令。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369页。但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英方意见的分量显然要重于中方，因此在正式答复中未列入需日皇亲自签署投降条款的要求。如果列入此要求并落实的话，日本国内否认无条件投降的最主要依据就更不存在了。

③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米、英、ソ、中の各政府の名に於ける合衆国政府の日本政府に対する回答』、[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48000\[2020-11-20\]](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48000[2020-11-20])。此文件依照日方存档日文文本译出。“联合军”即盟军之意。贝尔纳斯签署文件时间为8月11日，日本在12日凌晨的广播中得知回答内容，收到文件的时间为12日（东京与华盛顿有14小时时差）。另需注意的是，贝尔纳斯回答中的“自投降时始，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采取认为其必要的措施的联合军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之下”的关键之句，《国际条约集（1945—1947）》将之翻译为“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该司令官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步骤以实施投降条款”。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104页。中宣部学习出版社等制作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抗战》第12集《日本投降》中翻译为“自投降之日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须受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比较而言，翻译为“受……监督”似乎距原意更近些。

确限制，置其于盟军最高统帅权力之限制之下；第二步，对未来的日本政体形式如何，即是否保留天皇制或保留什么样的天皇制，由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投票）决定。这与《波茨坦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换言之，将来如果保留了天皇制，只要是多数日本国民的选择，则盟国不反对其存在。日本天皇制的存废与日本投降时其提出的条件是否被盟国接纳毫无关系。^①

在此主要涉及日本对贝尔纳斯的英文答复的翻译问题。答复中的关键句是“自投降时始，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采取认为其必要的措施的联合军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之下”，其英文原文是“From the moment of surrender, authority of the Emperor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to rule the stat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 who will take such steps as he deems proper to effectuate the surrender terms”。^② 其中的关键词是“subject to”，日本外务省翻译为“限制”，陆军省翻译为“隶属”，二者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但无论取哪一种译法，都表明日本投降后日皇再不会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必须听命于盟国最高统帅。显而易见，日本的“不改变天皇之国家统治大权之要求”被盟国断然拒绝。

对如此明确之答复，日本统治集团高层中，既有认为盟国在天皇问题上以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默认了日本要求，日本应照单接受盟国的答复者；也有感到失望、沮丧，认为答复语义不明，担忧若全民表达意志则有可能导致天皇制不保，应再进行交涉者；军方和主张国体论的势力则认为答复并未满足日本提出的条件，主张明确拒绝答复，其态度更加嚣张强硬。^③ 尤其军方，因为盟国要将日皇“隶属”于最高统帅而认为“这显然冒渎了作为国体根基的天皇的尊严”，必然会招致“我国体破灭、皇国灭亡”，应“坚决严拒”。^④ 这也是军部高层主张再

① 所以，史汀生陆军部长也说，盟国的答复既避免了立即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也使日本人安心。参见：波多野澄雄『宰相鈴木貫太郎の決断—「聖断」と戦後日本—』、184頁。

②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米、英、ソ、中の各政府の名に於ける合衆国政府の日本政府に対する回答』、<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48000> [2020 - 11 - 20]。9月2日的《（日本）投降书》英文文本基本照搬了此句。

③ 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632頁、655頁。

④ 『増刊 歴史と人物 太平洋戦争—終戦秘話—』、中央公論社、第150号、1983年、29頁。引文中所称“国体”与我国政治学中“国体”一词含义不同，专指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国家政治结构。陆相阿南唯几认为，如果原封不动地接受盟国的答复，日本将亡国，维护国体终不可能。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即认为，“subject to”无疑具有相当强烈的接受指挥、指示及从属的意思，外务省为缓和军方的抵抗和反对才译成“接受限制”。国体若由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来决定，则会完全否认迄今的唯神国体而建立新的国体，这完全与日方申告中提出的天皇大权不受任何改变相矛盾，这不是没有回答日方提出的条件、顾左右而言他，不如说就是否认了日方的要求。参见：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678頁、680頁、681頁。

次照会盟国，中坚将校不惜发动政变以贯彻其主张的原因。^①

8 月 12 日，日本正式收到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盟国的答复，东乡即向铃木贯太郎首相表示，不论此答复中是否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要求，日本接受盟国的这个答复没有障碍。其主张也得到日皇的嘉许，日皇称如对方答复的那样即可，要迅速接受。^② 东乡身为外相，掌握驻外使馆发回的情报，深知日皇与日本国家所处之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决定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问题上，每拖延一分，危险就增加十分。^③ 尽管他认为难以断言盟国的答复是否承认了日皇的统治权，但在临时内阁会议上，东乡态度坚决地反对因认为盟国答复对日皇统治权未明确认可或应追加条件故主张再次向盟国提出照会的“再照会论”。阁议后，东乡再次向铃木首相表示，若不准备与对方决裂的话，就只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对方的答复，陛下是不希望继续战争的。^④

紧接着在 8 月 13 日的内阁会议上，虽然仍有阿南陆相等少数阁僚主张再次照会四盟国，若这些国家不给予明确回答则不得已与之进行决战，但多数阁僚转为主张立即接受盟国的答复。厚生相冈田忠彦表示：“应以尺蠖之屈的心境接受对方的答复。”^⑤ 这或许道出了多数阁僚的心情，为日本忍受面前的耻辱，寻求未来的复兴。铃木首相最后发言自解心宽：“鉴于形势的重大变

① 中方也有学者认为，盟国答复中“自投降时始，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采取认为其必要的措施的联合军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之下”这句话“隐含有承诺保留天皇制之意”，日本投降后也保留了天皇制，所以日本的投降是有条件投降，而不是无条件投降。参见柳建辉、孙新编著：《正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辨析》，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 年，第 277 页。这种视“拒绝”为“隐含”，是将日本投降的时间段拉长之后得以形成的看法，把投降之日本与被占领之日本混为一谈，有失客观。

② 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648 頁、649 頁。“如对方答复的那样即可，要迅速接受”的日文为“先方の回答のままではよろしい、速やかに受諾せよ”。

③ 东乡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回忆说，根据多渠道情报，盟国给出答复时，有些国家关于日本皇室问题态度强硬，由于英美领导人的压制才做成这样的答复。如果日方要求修改这一答复，则可能像以往不战条约问题时那样，不仅有日方主张得不到贯彻之虞，强行推进交涉还会给对方各国的强硬派提供口实，而终至决裂，这是不可以的。参见：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651 頁。另据时任外务次官松本俊一于 1949 年回忆，1945 年 8 月 12 日，日本收到盟国答复后，又收到日本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的电报，称这次对方的答复是美国费了很大力气搞成的，苏联和中国反对天皇制，连英国好像也只是暂时承认天皇制，甚至如伦敦《泰晤士报》都登出“埋葬被神化的天皇制”的社论。这就是国际形势的实情，如果再交涉，是否能保住天皇制难以预料。参见：佐藤元英·黒沢文貴編『GHQ 歴史課陳述録—終戦史資料—』（上）、347 頁。

④ 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649 頁、651 頁、691 頁。

⑤ 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687 頁。《周易·系辞下》有文“子曰：……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参见：《周易》，中华书局辑刊《四部备要》（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56 页。

化，我改变了继续战争的想法。这次得到对方的回答，其中似乎有难以接受的条款，但仔细阅读后感到美国并无恶意，实际上并不要求改变天皇（制）。不能因国情和思想不同而在词语上提出异议，即使希望改变表达方式，对方也不会理解。担心的是保障占领和解除武装，需要双方共同注意。如果继续打下去，即便排出背水之阵，在有原子弹的今天，已为时晚矣，维护国体也绝无可能。无论如何（接受答复）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死中求活吧。”^① 铃木所称“难以接受的部分”即已明知日本要求的投降条件被驳回，只能以“美国绝无恶意”“词语上提出异议无意义”等自我安慰一番，并规劝强硬派接受投降主张。^② 在8月14日11时（东京时间）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日皇明确表示：“通览复文之文意，理解对方所持之相当好意；如果此时再继续战争，将会国成焦土，万民遭更大苦难；请陆海军大臣理解我的心情，共同努力，很好管制部队。”^③ 正是在东乡的坚持和日皇的支持下，日本明知盟国答复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条件，但迫于形势的重压，也未再提出任何条件，而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盟国的答复，实际上也就是无条件地接受了《波茨坦宣言》。

日皇在御前会议决断后，内阁开会，遵照日皇旨意，起草日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诏书》。^④ 由于内阁实施连带责任制，只要有一名阁员反对，则无法形成决议。阿南认为原稿中“战局日益于我不利”这一句会使民众认

① 外務省編纂『終戰史録』、687頁。

② 同日，日本外務省的调查报告认为，盟国答复的“第一项表示敌方直率，有诚意”，“占领军进驻帝国后，行使主权受占领军限制乃不得已，不如说是当然之解释”；“全文表示敌方至少在占领军驻屯期间是承认天皇陛下并日本政府及大本营的”；“第五项乃直接引用《波茨坦宣言》作为回答，本来国体如何求外国保障乃本末颠倒，当然应由国内决定，故敌方称无意干涉内政而委之国民之自由意志，当然不应有更大期待。敌方从民主政治的立场出发，这样说是当然的”；“本答复重复了《波茨坦宣言》，没有超出其范围，我方既已称接受该宣言，若不接受此答复而试图要求改变宣言内容，则不仅会使敌方感到我方无诚意而不能取得任何实效，进而拒绝进一步的交涉”。参见：外務省編纂『終戰史録』、645頁、646頁。外相东乡茂德据此主张接受盟国答复，并得到日皇的支持。

③ 外務省編纂『終戰史録』、701頁、702頁。

④ 需指出的是，日皇的所有诏书原名皆为《诏书》，诏书名前的限定语均为事后或旁人所加，如《宣战诏书》《终战诏书》中的“宣战”“终战”皆如是。至于所加部分是否合适，尤其中方学者能否照搬使用，需谨慎考虑。例如，1945年8月14日的《诏书》，其中“朕使帝国政府向美英支苏四国通告接受其共同宣言”，完全显示出日皇及政府认可战败投降之意，显然若名之为“接受《波茨坦宣言》之诏书”或“败战诏书”尚可理解，而日方却名之为“终战之诏书”“关于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9月2日的《诏书》，其中“在投降文书上代朕署名”，显然应名之为“投降诏书”，而日方却名之为“关于在大东亚战争终结之关系文书上签字之文件”。参见：日本国立公文書館、<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1744405> [2020 - 11 - 20]、<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682643> [2020 - 11 - 20]。日方如此命名，其用心显然在于掩盖战败投降之事实。其实，以年月日编号《诏书》是科学明了、避免弊病的最佳方法。

为大本营以往发表的战报虚假不实，经阁议改成“战局未必好转”，于是阿南未再进一步坚持己见。诏书定稿后，经日皇签名盖章、阁员联署并发表。

14 日 23 时（东京时间），日本政府发电日本驻瑞士、瑞典公使，指示其立即要求驻在国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转达《日本帝国政府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通告》：“帝国政府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八月十日之申告并八月十一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所发美英苏支四国政府之回答，与之相关，对右四国政府荣幸通报如下：天皇陛下已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天皇陛下准备授予并保证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为实施《波茨坦宣言》各项条款所必要的在投降条款署名之权限，命令日本国一切陆海空军官宪及不问何地之此等官宪指挥下之一切军队停止战斗行动，交出武器，及发出最高司令官为实施投降条款所要求之命令。”^① 瑞士伯尔尼时间 20 时 5 分（东京时间 15 日 4 时 5 分），加濑公使将日本政府通告递交给瑞士政府外务次官，美国华盛顿时间 16 时 5 分（东京时间 15 日 6 时 5 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华盛顿接到美国驻瑞士大使发回的日本通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国投降的消息。贝尔纳斯联络英、苏、中三国，约定 19 时（华盛顿时间）四国首都同时宣布此消息。18 时（华盛顿时间）瑞士驻美公使代办将日本政府的《通告》文本交给贝尔纳斯。华盛顿时间 19 时（伦敦时间 24 时，莫斯科时间 15 日 2 时，重庆时间 15 日 7 时，东京时间 15 日 9 时），美英苏中四国如约同时宣布了日本政府通告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宣读了如下声明：“我在今天下午接到了日本政府对国务卿 8 月 11 日所发出照会的答复。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答复中没有任何保留。”^② 显然，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是以 14 日发布《日本帝国政府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通告》为标志，而不是以 15 日 12 时（东京时间）日本广播日皇宣读的接受

①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ポツダム」宣言の条項受諾に至る経緯』、<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48500>[2020-11-20]。

②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 376 页。由于《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 374 页将 14 日 19 时发布日本政府通告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消息之事，错记为 15 日发布（不是原文如此错还是中文本错排），结果许多中国学者未能仔细计算，而以讹传讹。瑞士伯尔尼时间 15 日 4 时 42 分，加濑公使向日本外务省发电称：“15 日午前 3 時半，（瑞士）外务次官向本使转达如下：美国国务卿对瑞士驻美公使称，（美方）认为 14 日帝国政府通告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及 11 日的四国答复，故依美国总统之命发出通信，请立即电报帝国政府。”参见：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ポツダム宣言受諾に関し、瑞西、瑞典両国を介し、連合国側に申入れ関係 自昭和二〇年七月』、<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00400>[2020-12-01]。

《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为标志。播放日皇宣读之《诏书》的主要目的乃针对日本军民，压制军队中的反抗活动，平抚百姓中的失衡心态。

这一历史过程清楚表明，对于《波茨坦宣言》以及盟国答复所列条件，此时日本只能不再讲任何条件地全部接受，故而日本的投降，当然应被视为百分之百的无条件投降。日皇、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军队无条件投降，就是国家完全放弃了抵抗权，就是包括日皇、日本政府、大本营和国民在内的日本国家的无条件投降。

9月2日，在日本天皇、政府、大本营代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日皇裕仁向日本国民发布投降《诏书》称：“朕接受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英支各国政府首脑在波茨坦发表、后有苏联参加的宣言所列诸项条款，（由重光葵、梅津美治郎）在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向帝国政府及大本营提出的投降书上代朕署名，且按照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指令向陆海军发出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放下武器，且诚实履行投降书中的一切条款，及帝国政府和大本营发出的一般命令。”^①这份诏书表明，日皇以代签的方式在盟国最高统帅向日本天皇、政府、大本营提出的投降书上签字，因此形成日皇和日本政府向盟国投降的既成事实。反而言之，如果说日皇和政府没有投降，则只要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即可，而无必要非要日皇和日本政府的代表也在投降书上签字而且是先行签字不可。

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向美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日本人刚才正式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他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②由此可见，“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杜鲁门的脑海里印象有多么深刻。

（二）美国初期的对日政策执行中虽有偏差，但总体上与《波茨坦宣言》精神相一致

美国初期对日政策的首要点便是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在投降后出尔反尔，在15日又通过瑞士政府向四国提出通报盟国舰队和军队进驻日本的时间、尽量减少占领区域、日军自我解除武装、允许军人佩剑以保持荣誉、不强制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人服劳役等要求。^③东乡外相特别向加濑公使解

^①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御署名原本・昭和二十年・詔書九月二日・大東亜戦争終結ニ関スル関係文書調印ニ関スル件』、<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04017701000>[2020-12-01]。

^②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406页。

^③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ポツダム」宣言の条項受諾に至る経緯』、<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48500>[2020-12-01]。

释称：“右之申告始终不过是开陈我方希望，而不是提出接受宣言的条件，然为今后实行敏感困难的共同宣言规定实施的条款，是极为重要的。”^① 对此，杜鲁门认为：“我们不能在刚开始占领的时候就来商讨占领的条件。我们是胜利者。日本人是战败者。他们必须懂得‘无条件投降’不是什么可以谈判的东西。根据我的指示，国务卿贝尔纳斯发出一封很不客气的回电。”该回电称“这类问题应当与最高统帅在他所决定的时机进行联系”。^②

8月16日，盟军最高统帅致电日皇、日本政府、日本大本营，“命令日本国政府派遣具有权限之代表至菲律宾马尼拉联合国最高指挥官司令部，受领以日本国天皇、日本国政府、日本国大本营名义履行投降条件的各项必要要求。”^③ 当日，杜鲁门发布纪念牺牲者、感谢上帝的祈祷日的宣告书，称“日本军阀和日本的武装部队投降了，他们无条件地投降了”。^④ 同日，美国国防部统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制定了《日本及其领土的最终占领》(JWPC385/1)文件，设定了美英中苏四国的占领区（苏联占领北海道及日本东北地区，美国占领本州中央地区，中国占领日本四国地区，英国占领日本中国地区和九州，东京由四国共同占领）。^⑤ 也是在这一日，斯大林致信杜鲁门，除表示整个千岛群岛应归苏联所有外，还提出北海道北半部应由苏联占领，苏联这才算占领了日本领土。^⑥ 如果斯大林知道美国国防部将提交 JWPC385/1 文件的话（有时差），就决不会仅仅提出占领半个北海道的要求了。杜鲁门明确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18日批准了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美英中苏分割军事占领日本、美国任命最高统帅掌握占领主导权的 SWNCC70/5 文件（后改为以美军为主实施占领），22日又批准了 SWNCC150/3 文件，决定了所谓“利用日本政府在日进行‘间接’统治”的方针。^⑦ 26日，盟军舰队进泊相模湾；28日，以美军为主的盟军开始登陆进驻日本（进

①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ポツダム宣言受諾に関し、瑞西、瑞典両国を介し、連合国側に申入れ関係 自昭和二〇年七月』、<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00400>[2020-12-01]。

②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400页。

③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連合国最高司令部発、日本天皇、大本营、政府宛電信 自昭和二〇年八月』、<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10900>[2020-12-01]。

④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394页。

⑤ 「日本の分割統治計画_日本の分割統治計画の概要」、https://www.weblio.jp/wkpja/content/日本の分割統治計画_日本の分割統治計画の概要#cite_note-ioki-7[2020-12-01]。

⑥ 方连庆等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96页。

⑦ 「日本の分割統治計画_日本の分割統治計画の概要」、https://www.weblio.jp/wkpja/content/日本の分割統治計画_日本の分割統治計画の概要#cite_note-ioki-7[2020-12-01]。

驻日本美军预计约 50 万人)，另有少量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进驻东京和横须贺。30 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到达日本。1946 年 2 月，英联邦军队（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军队组成，最多时达 4 万人）进驻日本，履行占领日本中国地区和四国地区及协助美军占领首都圈的任务。^① 由此看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盟国对日占领是在特定背景下按美国的预定计划进行的。日本没有陷入德国那样被分割占领的境地，是因为美国最终决定了利用日本政府在日进行所谓“间接”统治的方针。这是形势变化造成的结果，并不能改变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历史事实。

麦克阿瑟刚到日本，杜鲁门总统即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公文，专门向麦克阿瑟解释最高统帅的职权范围：“你作为同盟国最高统帅，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应从属于你之下。你可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履行职责、行使你的权力。我们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种契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由于你的权力是无上的，因此，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你不应当对这种权力的范围抱有任何怀疑。”“管制日本的工作应当通过日本政府来进行，而以采取这种办法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度。这并不损害你在必要时直接采取行动的权利。你可以采取你认为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强制执行你所发出的命令。”“《波茨坦宣言》中关于占领意图的申述，将予以充分实施。但是，予以实施将不是因为考虑到由于有了这个文件而使我们不得不同日本保持一种契约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尊重关于这种意图的申述和予以实施，是因为《波茨坦宣言》是我们诚心诚意声明过的关于对待日本和对待远东的和平与安全的政策的一部分。”^② 此公文再清楚不过地厘清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皇及其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日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从属于最高统帅，受到极大的削弱和限制，最高统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该文件于 9 月 24 日在美国华盛顿公开，26 日日本《朝日新闻》转载了详细内容。

与此同时，日本签署投降书的 9 月 2 日，由盟国最高司令官、美国陆军元帅麦克阿瑟签署并欲发布盟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告日本国民”的三份布告，其第一份布告的开头便毫不含糊地指出：“由于日本帝国政府向

^① 中国军队对于是否进驻日本参加占领的态度反复不定，最终中国政府未派军队赴日参与占领日本。其原因，表面上是不给苏联派兵进驻日本提供借口，实际上则是蒋介石即将挑起全面内战，必须把精锐部队留在国内对付共产党。

^②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 401 页。

联合国军无条件投降，日本国军与联合国军之间长期进行的武力纷争至此宣告结束。基于依日本国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大本营之命，且以其名义署名的投降书诸条款，本官指挥下之战胜军本日开始占领日本国之领土。基于本官作为联合国最高司令官被赋予的权限，兹对日本国全部领域并其住民，设置军事管理，布告以下占领条件。”“日本帝国政府包括行政、司法及立法三权的一切权能，今后置于本官权力之下行使。”第二份布告则告之所有日本人，若违反占领军规定、破坏占领秩序，则由占领军法院审判，最高可判死刑。第三份布告是关于发行 B 军票以控制金融经济的指示。^①显然，这是 GHQ 对日本即将实施军政统治的宣告，在确认“日本帝国政府向联合国军无条件投降”的前提下，实施“军政统治体制”，日本政府将成为徒有政府形式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盟军总部之下的事务机构。

然而 9 月 3 日，重光葵面见麦克阿瑟，在向麦克阿瑟大表忠心后，要求 GHQ 不要直接向日本国民发布上述布告，意即不要实行军政统治，而是向日本政府发布指令，由日本政府执行，以免日本国民完全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引起国内混乱。麦克阿瑟不留情面地一口回绝：“如昨日演说所述，依胜败事态既决，日方必须完全履行承担之义务，决不允许回避或反对，期待日方将一切义务忠实履行到底。”但他同时又说：“我等完全没有破坏日本国、以（日本）国民为奴隶的想法，不如说要帮助日本克服困难。既然日本政府充分显示了诚意，问题就简单了。（日本）政府与国民的态度一致，怎么做都行。布告的内容完全由日方之手履行没有障碍。如果这样就变成司令官对日本政府的命令案了。”^②最终，这三份布告没有公布，日本未进入被战胜国军政统治的状态。^③

麦克阿瑟制定了预定实行军政的三份布告，但一代战将竟然被重光葵三寸不烂之舌鼓动而显出“仁心”，又轻易放弃了这三份布告，其中有何机缘，

①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連合国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布告第一号—第三号』、<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51100>[2020-12-01]。依日文原件译出。

②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布告関係（昭20年9月3日、重光外務大臣、マックアーサー会見関係あり）』、<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7070000700>[2020-12-01]。引文依照日本外务省整理的日文版谈话记录译出。

③ 因此也引起美英苏社会舆论的不满，认为麦克阿瑟对日手软，要求他严格执行《波茨坦宣言》条款，必须让日本充分认识到他们已经完全失败投降。另外，那种认为在日本没有实施德国那样的军管体制，便不能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日本投降与投降后的占领体制，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值得思考。一是前述关于最高统帅的职权，杜鲁门已表示，麦克阿瑟“可以在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履行职责时行使自己的权力”，对统治日本其权力是“无上”的，即或有与美国高层意志不一致的地方，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二是鉴于已有的对德国实行军政的先例，麦克阿瑟本人对军政统治抱有较大成见。他认为“历史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一次现代的对战败国的军事占领是成功的”，“如果任何占领状态持续过久，或一开始并不小心注意，那么一方就变成奴隶，另一方就变成主人。历史也教导我们，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的新的战争”。^①当然，防止苏联插手也是一重要因素。所以，麦克阿瑟摒弃了德国模式，而要创出日本模式。三是既然杜鲁门已经批准了SWNCC150/3文件，则接受重光的要求乃顺理成章，而且日本模式与《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和精神并无抵触。四是麦克阿瑟登陆日本时的切身体验。尽管参谋人员极力反对麦克阿瑟只带领少量参谋和先遣队降落厚木机场，因为该机场是神风队的训练基地，东京周边驻扎有30万日军，显然极不安全。但当看到3万日本士兵规规矩矩地面朝外站在通往横滨的街道两旁以护卫这位曾经的“敌寇”时，麦克阿瑟感到了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and 影响。如果没有天皇的裁断，要使尚拥有近700万军队、其中250余万驻守本土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仍将是非常困难的。“当华盛顿有点转向英国的观点（作为头号战犯审判日皇）时，我就提出要采取这一行动，至少需要一百万人的援军。我认为如果天皇作为战犯受到控告或被绞死，那么整个日本就必须建立军事管制政府，而很可能爆发游击战争。”^②所以，盟军充分利用天皇和日本政府进行间接式管理，实属必要。

还有一个历史事实可以表明美国初期对日政策的坚定性。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5日美国政府即指示日本政府将其全部外交及领事机构的财产和档案文件等转交给盟国政府所属机构。但日本政府却想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以表明日本政府并未包括在投降范围之内。日本政府接到此指示后，便以此指示不符合《波茨坦宣言》中的任一条款为由拒绝执行。17日，东久迩宫内阁成立，重光葵任外相，日本对待无条件投降的态度又发生变化。22日，日本外务省条约局第二课制定《关于帝国接受〈波茨坦宣言〉及外交权之文件》称：“有论者认为，帝国对美、英、支、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所

^① 《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76、177页。

^② 《麦克阿瑟回忆录》，第183页。

以尔后作为战胜国的此四国对战败国帝国可以无任何限制地强加其单方面的意图，对帝国的主权可以加上一切限制。但按照《波茨坦宣言》的规定，有‘一切帝国军队’‘无条件投降’的事实，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投降后帝国的主权可由四国恣意‘无条件’乃至无限制地加以制约。”《波茨坦宣言》“即帝国与四国都是为终结战争，由四国提示、我方接受而成立的合意，故双方应依《波茨坦宣言》之规定严格约束，对帝国主权的限制应在合意之范围内进行”。而且 8 月 11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四国政府答复亦称：“自投降时始，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采取必要措施的联合国最高指挥官之限制之下。”“显然，投降后天皇及日本国政府仍保留着国家统治权，此国家统治权不仅包括对内主权，也应包括对外主权。”^①

此后，日本外务省又在签署《投降书》后的 9 月 10 日发出文件《关于投降书的说明》，进一步对日本投降之事进行辩解。文件开篇即谋求突出日皇的地位，称投降书中“依日本国天皇、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且代表其接受”的表述“将天皇与政府和大本营置于并列地位甚不合理”，特别强调“为诚实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和关于最高司令官及联合国代表的要求事项，天皇及日本国政府可以发布必要的命令，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且任何“变革天皇‘国体’的意图都是不适当的。虽然天皇和日本政府行使统治权受到限制，天皇的统治权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委任，但最高司令官并不取代日本政府行使统治权”。“值得注意的是，（本降书）只规定了‘大本营及日本国军队’的无条件投降，而将帝国和帝国政府除外。”^②

针对日本外务省的一再狡辩，GHQ 于 10 月 25 日正式发出指令，指示日本政府将在国外的各大使馆、公使馆及领事馆的全部财产和公文档案移交给盟军代表。26 日，日本政府向 GHQ 提交备忘录，仍自我表白称日本正尽最大努力，确保忠实履行《投降书》的条款，驻各中立国的代表也都在严格并忠实地遵守《波茨坦宣言》和《投降书》的条款。如果执行该指令，不仅会损害日本政府在国内的威信，而且会使全心全意合作、忠实执行投降条款的日本人民感到痛苦和失望。但 GHQ 业已看穿日本企图以保持与所谓“中立国”

①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一般問題 自昭和二〇年八月』、<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28700>[2020-12-01]。引文中的“合意”，其约束力介于共识与合约之间。“联合国最高指挥官”即盟国（驻日盟军）最高统帅。

②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詔書、降伏文書、ポツダム宣言等/(2) 降伏文書に関する説明』、<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39500>[2021-12-01]。

的关系来维持日本外交权的用心，于11月4日再发指令，指示除得到GHQ许可，日本政府必须停止与各中立国政府及其驻日代表的正式关系，各国的外交使节驻在日本，与盟国占领日本的目的和性质及盟军最高统帅的地位不能并存，各中立国代表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应询问GHQ后方可处理。11月18日，GHQ再次发出指令，明确指示日本政府必须断绝与国内及海外诸国的外交关系，拒绝了日本欲给予其涉外官员保护、监督在各中立国的日本人的权限的要求，同时要求各中立国政府任命有外交权限的代表维持与GHQ的联系。至12月10日，GHQ继发照会，明确指示日本政府，无GHQ允许，日本外务省必须停止与日本驻外代表的一切通信联系，即使部内联系也不允许。^①至此，日本欲变相维持外交权的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迎来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关于日本政府有无内政权，据竹前荣治监修《GHQ指令总集成》，从1945年9月至1952年4月，GHQ共向日本政府发出各种指令2600余件，其中经济科学局（ESS）发文最多达663件，民间通信局（CCS）366件，参谋部（G1、3、4）596件，法务局（LS）285件，民间财产管理局（CPC）200件，其他还有民间谍报局（CIS）、公共卫生福利局（PHW）、民间情报教育局（CTE）、民政局（GS）、天然资源局（NRS）和军政局（MG）等发出了多少不等的指令。^②显然，占领时期的日本政府，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其主要行政事务均须听从GHQ指令行事，其行政权变成了“行事权”，这是再明显不过的。

对于日本投降后保留了天皇和日本政府，这并不能成为主张天皇和日本政府没有投降的论据，还可见9月6日，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联合制定并于同月22日公开、24日《朝日新闻》全文介绍的《美国关于投降后日本的最初政策（声明）》。该文件明确宣示现阶段“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力隶属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占领和管理日本，为实行制定的政策，而必须具有行使一切权力的最高司令官。鉴于当前日本社会的性质并美国希望以最小兵力和资材达成目的，最高司令官在充分促进实现美国目的的范围，可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关及各机关行使其权力，可允许日本政府在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下对于国内行政事项发挥通常的政治机能，

^①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一般問題 自昭和二〇年八月』、[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28700\[2021-12-01\]](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28700[2021-12-01])。

^② 竹前荣治監修『GHQ指令 總集成』（第1卷）、平凡社、1994年、10—30頁、解説。

但此方针置于在天皇或其他日本机关在实施投降条款上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时，最高司令官有要求改变政府机构或人事乃至采取直接行动的权利和义务之下。还有，此方针并非使最高司令官压制为实现美国目的所进行的前进性改革而支持天皇或其日本政府机关，即此方针是利用现在的日本统治形式，而不是要支持它。修正封建性的、权力主义倾向的统治形式的变革，无论由日本政府或日本国民进行，都应允许和支持。为实现这一变革，日本国民或日本政府为压制其反对者而行使强力时，最高司令官为保障其麾下部队安全并达成占领目的，可在必要限度内加以干涉。“美国对日的最终目的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建立尊重其他国家权利、支持由《联合国宪章》的理念和原则所表达的美国目的的和平且负责任的政府，并希望这一政府尽可能地符合民主主义自治原则，但盟国的责任并不是强加给日本未得到国民自由表达意志之支持的政体。”为实现此目的，需采取的主要手段首先是领土主权限制。“日本之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应依《开罗宣言》和美国已参加或将来应参加之其他协定决定的附近非重要岛屿。”第二项手段是“日本完全解除武装，实现非军国主义化。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扫除军国主义者的权力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力，强力压制体现军国主义及侵略精神的制度”。其他还有支持自由人权、发展经济等。^① 简言之，该政策强调最高统帅为实现美国目的必须强化权力，而不是反过来支持天皇和日本政府当局，对日本现政府形态，不是支持而是利用。

^①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降伏後における米国の初期の対日方針（一九四六．九．六）及び降伏後の日本軍政基本指令（一九四五．一一．三）／（1）降伏後における米国の初期の対日方針 昭和二〇．九．六』、<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39900> [2021 - 01 - 05]。此文件的概要曾在 8 月 29 日传达给麦克阿瑟（可能即前述专门解释最高统帅的职权范围的公文），这说明美国已对占领日本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和准备。此文件依照日方存档之日文文本译出。对文件中所称“日本国民或日本政府为压制其反对者而行使强力时”之“强力”，《朝日新闻》刊载时皆译为“武力”，刊载美国官方的相关评论时也都译为“武力”。所以，日本政府译为“强力”是否为有意压低“武力”之影响，值得注意。此文件明确表示不支持而只是利用日皇和日本政府，主要是因为此时美国国内要求追究日皇的战争责任、要求审判日皇的舆论氛围正浓。另外，此文件的基本精神亦体现在 1947 年 8 月 19 日远东委员会通过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中。该文件指出：“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天皇及日本国政府之权能，将隶属于最高统帅。最高统帅具有实施投降条款、执行占领及管制日本国的各种政策之必要的一切权能”。“最高统帅将经由包括天皇之日本国政府机构及机关而行使其权能，但以促进完成上述目标与政策为限。日本国政府得遵照最高统帅之判断及裁定，行使关于国内行政事项之通常统治权限。最高统帅亦得不经日本国政府机关而在任何场合命令应采取的措施。”“最高统帅不必约束支持天皇及其他任何日本国统治权力者。盖其政策乃在利用日本国现存统治形态，而并非支持之也。凡日本国民变更其投降前之天皇制形态，修正或去除政府形态中的封建的权力主义之性质，而建立民主之日本国，对朝向此方向之变更必须予以鼓励。”

许可并支持日本国民或行使武力以变革具有封建官宪主义倾向的政府形态，非必要时不加干涉。美国官方的解释是，华盛顿认为，在日本国内维持现秩序并非那么重要，美国助成日本人民或政府匡正、变革封建的政治形态，如果革命主义者要颠覆现存统治阶级并付诸实际行动，甚至伴随着行使武力时，麦克阿瑟元帅及其麾下部队是不会加以干涉的。《纽约邮报》说得更直白：“如果日本国民为变革封建制度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则占领军对此没有干涉的意思。”^①

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随后于10月29日提出文件《联合国对日要求及其界限》，认为联合国（盟国）要求日本的全部军队无条件投降，废止大本营，承认现存日本政府，不施行直接军政，只要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要求能够得到圆满执行，则原则上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通过天皇及日本政府行使权力。但同时又将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置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从属下加以限制，并表示不支持现存的日本统治形式，允许并支持变更现存统治形式的企图，对日本政体如何决定不加干涉。此外还涉及处罚战争责任人及战犯，压制军国主义势力，助力民主主义，归还侵占土地，有限赔偿等等。^②显然，日本政府不是不明白在占领体制下自身的地位和权重，只不过是想要利用一切占领政策中的漏洞为日本谋取更大的利益罢了。但占领下之日本政府已非投降前之日本政府，怎能成为日本政府并未投降的证据？

（三）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同样不容否认

日本投降后几十年来，有一种观点逐渐时髦起来，即认为日本实际上只是向美国和苏联投降，而没有向中国投降。蒋介石主张对投降的日本要“以德

（转接50页注释①）

参见：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降伏後の対日基本政策』、[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7070001800\[2021-01-05\]](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7070001800[2021-01-05])。此文件亦依照日方存档之日语文本译出，与中文版本有出入。当然，《美国关于投降后日本的最初政策》与远东委员会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之间也有明确的不同点。前者有不干涉以武力改变现行制度的内容，后者改为鼓励变更但未指明包括武力变更。这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表明，两个阵营的对立开始显露雏形，5月艾奇逊在对日理事会表示反对共产主义，同时日本国内各种形式的大众斗争此起彼伏，声势日益强大，成为GHQ和日本政府日益担心的问题。当30家工会联合策划大罢工、喊出“打倒吉田内阁”的口号时，麦克阿瑟则如“叶公好龙”般立即下令禁止这一罢工。所以，美国对日政策的实质绝不是不干涉日本民众以武力改变现状，而是绝不允许红色势力日益强大，不允许日本民众在GHQ设定的范围之外进行改变现状的斗争（1950年搞“红色整肃”，显露更明显）。1946年7月，远东委员会通过了制定新宪法的各项原则，即包括废止天皇制、实现民主化等内容。所以在1947年的对日基本政策中出现“日本国民变更其投降前之天皇制形态”用语，可以认为是较此前前进了一步。

① 『朝日新聞』1945年9月24日、25日、27日。

②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連合国の対日要求の内容と其の限界（研究素材）（20.10.25条約局）』、[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07400\[2021-01-05\]](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8090007400[2021-01-05])。

报怨”，或许是产生这种论调的一个诱因。实事求是地讲，美国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成为促使日本最后放弃抵抗、选择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性因素，但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日，则是促使日本无力继续抵抗、只能选择无条件投降的长期性、关键性因素。虽然中国政府 1941 年 12 月 9 日向日本正式宣战，但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至 1945 年 9 月 9 日，中华民族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长达 14 年。1943 年 11 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召开开罗会议确定对日作战的原则方针，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四个主要大国之一，与美国共同成为亚太地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最主要国家。中国抗日战争 14 年间，中国战场总计歼灭（毙伤俘）日军 150 余万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有 128 万余人。^① 中国人民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 1945 年 9 月 2 日的受降仪式上，在降国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签字认降后，先由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代表全体战胜国签字受降，接着是战胜国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代表依次签字。中国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在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签字后第二个出场签字。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贡献的肯定和褒扬，那种“日本只向美苏投降，未向中国投降”言论只能是无视历史事实的妄言寐语。

不仅如此，若查看日本南方军、侵占南太日军、侵占朝鲜日军的各战区投降书，均依照对盟国《投降书》写成，在日皇和日本政府是否投降这一点上亦有被日方曲解可能之缺憾。然而，漏中有补的是，中国战区在与日本签

^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基本陈列中列举的数字，参见：《第七部分 伟大胜利 日本法西斯侵略遭到彻底失败》，http://www.1937china.com/kzjng/views/clzl/clzl_jbcl_detail.html?type=7 [2021 - 01 - 05]。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二战中日本在海外战场（包括冲绳、硫磺岛）阵亡者（日文为“戦歿者”）总数约 240 万人（不包括日本本土四岛被美军轰炸、原子弹爆炸而死亡者），其中在与美军的战役中阵亡者约近半数，有 120 万人左右（仅菲律宾就达 51.8 万人，冲绳 18.8 万人），在中国（未包括中国东北和台湾地区）阵亡 46.6 万人（如果加上中国东北和台湾地区以及缅甸战役中被中国军队消灭者，应有 60 万人左右，约为美军歼灭日军人数的二分之一）。参见：『戦没者遺族等への援護』、<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hokabunya/senbotsusha/index.html> [2021 - 01 - 05]。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达 128 万余人，若加上在中国东北被押往苏联的 60 万日军和在中国台湾的日军，则日本战败时中国牵制日军总数至少有 180 万人左右（加上少量军属，总数还会增加一些）。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字，1945 年 8 月 15 日时，日本在海外驻军总数为 335 万人。参见：『アジア各地における終戦時日本軍の兵数』、<https://honkawa2.sakura.ne.jp/8050.html> [2021 - 01 - 05]。由此可大致推断，至日本投降时，中国牵制日军人数为日本海外驻军人数的一半左右。这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中国战场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十分巨大的作用。日本若不向中国投降，其蒙受的战争损失必然更加惨重。

署投降书时注意到了这一点。9月9日签署的日本对中国战区的《降书》第一条即“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第二条“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第三条“吾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此《降书》共九条，最后是“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签字，图章）。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然而中方受降主官的签字名头是“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受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在中华民国南京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签字，图章）。”^① 看起来中方受降官的排场很大，不仅代表中国，而且代表美英苏“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受本降书”。《降书》中“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这句话，一清二楚地表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都已无条件投降，简言之即日本已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中国战区向中国政府投降已是铁铸的事实。可能是因为同属汉字圈国家，日本向中国的投降书成为词意表达最简洁明了的认定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文件。

综上所述，国际文件、条约和历史事实均明确显示，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向盟国投降，日方提出的所谓“投降条件”，并未得到盟国的认可，日本只能无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或称日本只能无条件地接受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所列之条件，在投降书上签字。虽然日皇和日本政府在投降后得到保留，这与盟国规定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取消或改造天皇制、利用或重建日本政府）并不矛盾，何况日皇和日本政府的代表归根结底是代表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即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这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是无论日本一些人如何狡辩也改变不了的历史定论。若从实力上看，战争末期的日本，已完全失去抵抗盟国进攻的能力，战争狂人的

^① 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現地軍降伏文書 中国』、[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9020469000\[2021-01-05\]](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B19020469000[2021-01-05])。引自日方存档之中文文本的日本在中国战区的《降书》。文中“联合国”即盟国之意。

叫嚣只能加剧日本民族被灭亡的危险。在以时分计的万分危急的时刻，日本若不选择无条件投降，不仅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多年打造的侵略扩张成性的“大日本帝国”将彻底灭亡，而且难以避免的是，日本民族将无法摆脱为天皇制军国主义殉葬的悲惨结局。所以，日本无条件投降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也是当时日本唯一可能的选择、唯一有利于日本民族的选择。^①

最后，如果日本一些人非要咬文嚼字，认定《波茨坦宣言》和《投降书》行文中只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的表述，据此只承认大本营和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而日皇和日本政府并未投降，更不是日本无条件投降^②，那么其他国家虽处正义，但对此狡辩也没有办法，不要指望这些日本人幡然悔悟，而只能吸取教训，寄希望于未来。

四、投降与“终战”

既然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为什么战后几十年来日本一直自称“终战”，避而不称“无条件投降”甚至“投降”呢？实际上，“终战”一词在战争末期就已经出现。日本统治集团眼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大势已去，但因为是“天皇的圣战”，又不能明言“失败”或“投降”，只能代之以“终战”之语，以此来继续维护日皇的尊严，模糊日皇和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战争责任，继

① 当代日本政府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说明称：一般称为“无条件投降”，但这是严密的法律用语还是普通用语，不好判断。在摆脱被占领状态后，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在很多普通场合说“无条件投降”并不会特别意识到这一点。鸠山一郎首相、佐藤荣作首相、福田起夫外相、小坂善太郎外相、奥野诚亮相等等均说过“日本无条件投降”之语。参见：『日本の降伏は、無条件降伏であるとの、政府説明』、<http://www.ne.jp/asahi/eccc/camera/HoppouRyoudo/ADD/Mujoukenkoufuku2.htm>[2021-01-05]。最后需指出的是，若按照前述理想主义式“无条件投降论”衡量，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基本做到，但也有不理想之处。日本投降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曾得到清理，但由于天皇及其旧体制存在，日本国内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理论、思想、主义批判得很不够，反而是努力温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论，漠视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给被侵略国的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和伤害的滔天罪恶。发展至今日，其不良后果愈加显现，不能排除这种危险动向会再次威胁、破坏东亚和平的可能性。

② 其实，不妨将日本的投降书与德国的投降书加以对照。1945年5月8日的《德国军事投降书》第一条是：“我们这些签名者代表德军最高统帅部，同意我们的陆、海、空军的所有武装力量以及现在由德军统帅部指挥的一切兵力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显然，德国的投降书说的也是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而未说总统和政府的事，与日本的投降书大致相同。以下各条，两份投降书也基本相同。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26、27页。所以，将两份投降书加以比较便知，既然德国是无条件投降，那么非说日本不是国家无条件投降，“天皇和政府没有投降”，就没有道理了。

续蒙骗广大的日本人民。

历史事实是，日本向美国宣战后仅仅经历了短暂的半年左右的“辉煌”时期，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就成为日本由盛向衰的转折点。随着美军在西南太平洋的反击逐步推进，日本很快陷入被动的不利局面。近卫文麿、吉田茂等担心战争长此进行下去，有可能激化日本国内的“赤化”运动，从这时开始，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内便出现了要东条英机下台、“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尽早终结战争”的声音（“终结战争”的简约表述即“终战”）^①。重臣冈田启介事后回忆道：“1943年夏，我认真考虑如何以适当方法终结战争。但所谓终战，是不能靠发动战争的内阁来实现的。若想朝着终结战争的方向发展，打倒东条内阁应是首先迈出的一步。”^② 这些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内出现所谓“终战”动向的早期记录。

1944年1月6日即开罗会议后不久，木户在日记中记曰：“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德意志崩溃即无条件投降时，日本是否同时采取措施终结战争”^③。显然，何时用“投降”，何时用“终结战争”（终战），木户是有分寸的。1945年2月14日，近卫文麿在给日皇的上奏文中说：“若在必然战败的前提下而论，继续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完全就是上共产党的当。从维持国体的立场考虑，我确信应及早采取终结战争的办法。”^④ 多处出现的“终结战争”成为近卫上奏文的主题词。

8月14日晨，木户进见日皇，委婉希望日皇“颁下立即终战的手续，陛下的考虑与我的想法完全相同，且态度十分坚决”。日皇“11时许，在御文库附属室召开了御前会议，在此处决定了大东亚战争的终结”^⑤。对此，事后安倍源基内务相说，这是“以陛下裁断的形式终战”^⑥，近卫文麿说“这次是因为木户的活动方能实现终战”^⑦。当日，日本政府印发《官报号外》，文件名为《诏书》。日皇裕仁在诏书中对日本国民只言“朕使帝国政府向美英支苏

① 参见：『木戸幸一日記』（下巻）、967頁；木戸日記研究会編『木戸幸一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46頁。

② 岡田啓介『岡田啓介回顧録』、毎日新聞社、1950年、205—208頁。

③ 『木戸幸一日記』（下巻）、1079頁。

④ 細川護貞『細川日記』、中央公論社、1978年、361—365頁。

⑤ 木戸日記研究会編『木戸幸一関係文書』、90—91頁。

⑥ 升味準之輔『日本政党史論』（第七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462頁。

⑦ 升味準之輔『日本政党史論』（第七巻）、463頁。

四国通告接受其共同宣言”，但并无“战败”“投降”“战争终结”等语。^①

15 日，《朝日新闻》第一版头条标题是“战争终结之大诏焕发”，并登载了《诏书》的全文，“圣心担忧新炸弹之惨祸，（命）帝国接受四国宣言，以开万世太平”，还刊登了 8 月 11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答复 5 条以及 7 月 26 日《波茨坦宣言》全文 13 条、1943 年 11 月 27 日《开罗宣言》全文。据此日文版《开罗宣言》译出的最后一句是：“右述三同盟国以右述目的与诸同盟国中与日本国交战中之诸国协调，继续进行为造成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所必要的重大且长期的行动。”^② 其中“为造成日本国无条件投降”的英文原文是“to procure th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f Japan”，此处的“Japan”一般译为“日本”，若译为“日本国”固然亦可，但日文版《开罗宣言》特意译为“日本国”，盖在表明日本人的理解中有明显突出日本国家的意识在内。既然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和《开罗宣言》，则日本作为国家无条件投降，应是日本自认如是而无法辩解的。所以，纵览《朝日新闻》全版内容后，则其头条标题中的“战争终结”之实意为何，日皇之“臣民”便一清二楚了。

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后，8 月 22 日废止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改组为“终战处理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终战事务联络委员会”，26 日设外务省属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专门负责应对 GHQ 的指示和要求。这是“终战”一词在国家行政事务层面的正式出现。28 日，《朝日新闻》刊登长篇报道《终战之经纬》。9 月 2 日，日皇在关于任命全权代表代其签署《投降书》的《诏书》中仍使用“投降书”一词，3 日的《朝日新闻》同时刊登了《投降书》的全文，但提醒道“投降书的要求仅限于军事项目，是日本军队的无条件投降；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统治权置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③ 4 日，日皇就第 88 届帝国议会的召开颁布《敕语》，称“朕已颁下战争终结之诏命，更派使臣签署了有关文件。朕希冀克服与终战伴随而来的几多艰苦，发挥国体之精华，布信义于世界，确立和平国家，对人类文化做贡献

① 参见：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官報号外（終戦の詔書）』、[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48200\[2021-01-10\]](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15060448200[2021-01-10])；日本国立公文書館『大東亜戦争終結ニ関スル詔書・御署名原本・昭和二十年・詔書八月十四日』、[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file/1744405\[2021-01-10\]](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file/1744405[2021-01-10])。

② 『朝日新聞』1945 年 8 月 15 日。

③ 『朝日新聞』1945 年 9 月 3 日。

献”。^① 此《敕语》于9月1日通过内阁审议并经日皇裁可。众议院的《敕语奉答文》则有“陛下先下战争终结之圣断，为万世开太平”，“赖陛下之凌威，今得护持国体，成终战签字”等句。^② 众议院通过的《感谢敬吊皇军将士并国民勤劳战士之决议》则有“然战局急转，畏颁终战之大诏，以收拾时局，开万世太平”之语。^③ 东久迩首相陈词中首先就说“要叙述至本次终战之经纬概要，披沥目前处困难时局之政府之所信，乃吾最严肃之职责”，“本次终战完全出自难得之仁慈大御心”。^④ 众议员町田忠治发言说：“……圣断遂下，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而至终战。”“然今听罢总理殿下演说，事情已极明了，国民亦谅承终战之不得已。”^⑤ 这些言论均以《官报》、报刊报道等形式公诸社会。

显而易见，日本自8月14日投降始，在其对内会议、文件、讲话或新闻报道中，“投降”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更不用说“无条件投降”了，“战败”“失败”出现亦不多，大量出现的用语则是“终战”。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学者的学术文章亦同样开始多用“终战”，少用或不用“战败”“投降”了。

当然也必须看到，在战后前期数十年中，这种用词法并无太多的主观上否认日本投降的意义，但在战后50年前后日本右翼思潮泛起后，日本右翼学者、文人、政客、军人等只用“终战”而禁用“投降”，则充分内含着其否认日本投降、赞美“崇高圣战”的主观意愿，“投降”一词的逐渐消失及“终战”词义的变化成为判断战后日本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参考。

综上所述，本文以大量、可信的历史资料，从多方面、多层次阐述日本的投降是百分之百的无条件投降，这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从德日两国的

① 『第88回帝国議会 衆議院 本会議（開院式勅語） 昭和20年9月4日』、<https://teikokugikai-i.ndl.go.jp/#/detailPDF?minId=008813245X00019450904&page=1&spkNum=0¤t=7> [2021-01-10]。

② 『第88回帝国議会 衆議院 開院式勅語奉答文起草の件委員会 第1号 昭和20年9月4日』、<https://teikokugikai-i.ndl.go.jp/#/detailPDF?minId=008810272X00119450904&page=1&spkNum=0¤t=8> [2021-01-10]。

③ 『第88回帝国議会 衆議院 本会議 第1号 昭和20年9月4日』、<https://teikokugikai-i.ndl.go.jp/#/detailPDF?minId=008813242X00119450904&page=1&spkNum=0¤t=6> [2021-01-10]。

④ 『第88回帝国議会 衆議院 本会議 第2号 昭和20年9月5日』、<https://teikokugikai-i.ndl.go.jp/#/detailPDF?minId=008813242X00219450905&page=1&spkNum=0¤t=3> [2021-02-20]。

⑤ 『第88回帝国議会 衆議院 本会議 第2号 昭和20年9月5日』、<https://teikokugikai-i.ndl.go.jp/#/detailPDF?minId=008813242X00219450905&page=1&spkNum=0¤t=3> [2021-02-20]。

投降书的文脉、用语基本一致可以看出，美国制定的日本的投降书，对日本并无任何特别照顾，更无任何将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排除在投降范围之外的考虑。从这方面讲，如果德国被看作无条件投降，则日本当然也应是无条件投降。在对日皇和日本政府的处理问题上，可以说《波茨坦宣言》采纳了“知日派”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明确提出的主张，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选择决定。美国国务卿代表盟国给日本的答复仍然维持了这一精神，没有给日本任何漏洞可钻。日本在重重打击下，若顽固到底必将招致民族灭亡，只能按照同盟国的意愿，原封不动接受《波茨坦宣言》，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再从美国的对日政策看，盟军占领日本，要利用日皇和日本政府进行管理、肃清军国主义势力、推进民主化等等，但当日本国民欲改变投降前的天皇制体制时，包括使用武力加以改变，占领军都不会进行干预。这就是在无条件投降的大范畴下，日本模式与德国模式的不同。所以，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日本有条件投降论”和“日本天皇、政府未投降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从“无条件投降”所应包含的内容讲，麦克阿瑟主导下的各项民主改革，并非无可指责处。尤其在政治思想、社会思潮领域，虽然确立了和平、民主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在批判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思想方面，即批判皇国史观方面，显然做得很不够，因此给战后日本的发展留下了不小的隐患。等到日本成为经济、科技、金融大国后，国际地位非昔日可比，皇国史观便借机复燃，否认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翻案，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狂人鸣冤叫屈、树碑立传。对其发展趋势，周边国家应保持高度的警惕。

（责任编辑：张耀之）

Abstracts

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Jiang Lifeng

On the issue of 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whether to retain the imperial system or not is not the key to judge 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r conditional surrender, and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is the most basic document to judge 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r not. The document is clear and unambiguous, allowing no further development or association. The document makes no direct provision on the existence or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system, but call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peaceful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reely expressed will of the Japanese people". Therefore, after Japan's surrender, "according to the freely expressed will of the Japanese people", the modern emperor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emperor system. That political reform in lin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had no contradiction with 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he historical fact is that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eve of Japan's surrender has determined that Japan has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if it does not want its nation to perish. Th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f Japan was the only goal that the Allies had fought for for years, whether Roosevelt or Truman, and that had not changed. The full text of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means that Japan must unconditionally surrender, that is, unconditionally surrend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stipulated in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Finally,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the Japanese militarist ruling group accepted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without any conditions, and 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has become an indisputable historical fact.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n Analysis of a Balancing Agenda

Wu Huaizhong

In Asia and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Japan is the most typical country that adopts the strategy of counterbalancing China. At present, although vigorously promoting internal balancing with its own strength, Japan still needs to mainly rely on external balancing and balances by strengthening allia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intensifi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plex game between major power, Japa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nterbalancing against China show a trend of simultaneous strengthening and mutual promo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acking in power and means while conducting the

日本語要旨

日本の無条件降伏について

蔣 立峰

日本の無条件降伏について、本文の主張は、日本天皇制を保留するかいやかは日本の降伏は無条件降伏であるか、有条件降伏であるかと判断する要件ではなく、かえって『ポツダム宣言』は依拠すべき基本的な文書である。この文書は条理ははっきりして、内容も明らかで、後人の發揮と想像を許す余地がない。この文書には、日本天皇制の存否に関する直接の規定がなく、降伏後の日本に「日本人民の自由に表す意志に依って平和に傾ける責任ある政府を設立する」だけ提出されたので、降伏後の日本に「日本人民の自由に表す意志に依って」近代天皇制と違った現代天皇制が設立されたのは『ポツダム宣言』の本義に合致する政治改革で、日本の無条件降伏とも矛盾しないと言えるだろう。または、日本の降伏の直前まで、日本側は民族の滅亡から逃れようとすれば、無条件に降伏する他に選択できる道がないという国内外の情勢に会ったという歴史事実である。日本を無条件に降伏させるのは、同盟国が長年奮戦した唯一の目標で、ローズベルトもトルーマンもこの点について一致した主張を持っていた。『ポツダム宣言』の全文は体現したものは、日本が無条件に降伏しなければならず、即ち『ポツダム宣言』の規定した条件そのまま通り降伏するほかないことである。日本天皇の関与に依って、日本軍国主義統治集団は最終的に条件も交渉せずに、そのままに『ポツダム宣言』を受諾したことによって、日本の無条件に降伏したことは疑いない歴史事実に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日本の対中安全保障戦略：バランスアジェンダの分析

呉 懷中

アジアと中国の近隣諸国の中で、日本は対中バランス戦略を採用する最も典型的な国である。現在、日本は自らの力に依拠した内部均衡を積極的に推進し、主に同盟と勢力均衡の強化による外部均衡に依拠する必要がある。中米間の戦略的競争の激化と主要国間の複雑な競争という新たな情勢のもとで、日本のこうした内外均衡策は、同時強化と相互促進の傾向が顕著になっている。一方で、実力ギャップと内部均衡手段の欠如を解決するため、日本は経済安全保障政策と攻撃力構築の促進に努めている。日本は、